

大学使命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向

——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崔延强¹, 邓磊²

(西南大学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 教育学部, 重庆市 400715)

摘要: 契约论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能够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判断。从契约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大学使命即大学与社会之间契约关系的体现。中世纪以降,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先后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数次重大调整,大学使命因此也相应地发生数次显著革新。时至今日,人类迈入后工业时代,知识社会已经到来并不断深化,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有了新的表述,大学使命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 契约论; 大学使命; 知识社会; 福利型社会; 现代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379(2014)02-0078-07

契约论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哲学观点,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从希腊的城邦文明,至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再到霍布斯、卢梭、洛克等思想巨匠对人类社会“深谋远虑的合理性”所做的长远谋划,契约论思想在社会建构和政治治理方面一直有所体现。尤其是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兴起以后,在现代化发展的裹挟下,契约思想成为民主社会建构的理论基础。在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中,契约论用来概念化社会铸造,是政治合理和政治顺从的基石,也是社会组织结构安排的理论基础。从契约论的角度观察大学使命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在政治哲学理论逻辑和大学组织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回顾与反思,这不仅是理解大学历史脉络的基本途径,也是把握现代大学发展方向的关键步骤。

一、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

关于大学与社会(抑或人民)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两种不同观点的影响:一种是认识论的,认为求知的目的在于“闲逸的好奇”;另一种是政治论的,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因为“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1]。根据这两种观点,人们对大学使命有着不同的理解。按照认识论的观点,大学是人类无尽探索未知的实验室,是人类精神财富传递和创生的平台,大学生活是经验的,是体验创造性文化生活的保留园地,因此大学使命就是超脱世俗,远离社会和政治的干扰,按照理性的认知逻辑进行知识献祭。按照政治论的表述,大学是国家组织,担负着现实的政治使命和社会使命,必须体现国家诉求和社会需要。从表面上来看,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意见相左,甚至不可调和,但如果从深层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二者却是大学组织的一体两面。大学在诞生之初就是承载着时代精神与现实功用的社会组织。中世纪,大学通过研究知识,连接神圣和世俗,切实起到了整合欧洲思维的历史功用。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使命也渐次实

*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崔延强,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磊,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现了从秉承宗教信仰到服务民主政治、从传承古典文化到面向市民社会的历史转折。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组织建立在世俗社会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获得种种特权的同时,亦需要负有面对社会和政府的义务。纵观大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大学与社会和政府既存在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大学承载的是人们向上仰望的目光,是信仰与理想的栖息之地;另一方面,大学也需要立足于世俗社会,承担培养世俗人才的组织义务。一旦大学过于远离尘世,就疏离了自己的义务;如果大学失去了仰望星空的精神,那么她就亵渎了自己的理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中世纪教会世界的职业期望,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抱负下的自由教育观念,再到启蒙运动下的科学研究和现代社会中的服务功能,大学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及其使命几经更迭。总而言之,大学与社会既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前提下相互呼应,同时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需求不断进行调整,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契约关系”。

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德里克·博克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政治概念,但却是一个启蒙式的隐喻^[2]。根据契约论思想,每一个作为社会细胞的人组成一个个独具功能的社会机构,而社会机构在另一种程度上作为个体,一方面从共同体获得权威,另一方面则要执行功能、履行使命。在政治哲学体系中,社会契约理论是用来概念化民主社会之铸造的,它是民主社会中政治合理和政治顺从的基石。在创建大学、确立学位授予资格以及对资金的分配等方面,政府和人民都是终极权威。政府赋予大学使命,并向其提供相对稳定的长期支持;为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大学拥有从政府获得的自治权的同时,教授们获得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大学最引以为豪的特殊权利,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念,但这并不是形而上的学者天赋,而是大学与社会的一种隐性契约。因为没有人可以规定探索真理的界限,所以学者在从事此类工作时获得了研究无边界的允诺,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没有自己的形式和方向。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探索,学术研究不仅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成果,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范式。尤其是在知识日益专化的背景下,不同学科逐渐形成具有严格区别和界限的“学术部落”,各自拥有独立的体系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领地”^[3]。大学必须在科学研究的框架下,经过系统、专门的习训,遵照科学的范式,在理性的范畴内从事相关劳动,并致力于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应用,根据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获得相应的认可和回报。总之,大学的诸多使命以及其特殊的地位建立在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之上,最终的合理性源自社会中的人民。

二、“社会契约”的调整与大学使命的沿革

大学缘起于中世纪,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大学与社会之间一直保持着隐形的“契约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社会契约”不断做出调整,大学使命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早期大学的“社会契约”及其“教导”使命

关于大学的早期历史,至今学界尚无一个明确的答案,哈斯金斯甚至认为早期的大学“没有创建人,或者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相反‘只是在成长’,缓慢地、悄无声息地产生,没有明确的记录”^[4]。尽管最古老大学的开端依然不甚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产生的时期是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1100年至1200年间,一股新的知识潮流以强劲的势头涌入了西欧,其中一部分经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不过主体部分是由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引进来的,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德(Euclid)、托勒密(Ptolemy)和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的算术论著以及在黑暗时代里被隐藏起来的罗马法教材……”^[5]⁷⁷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学尚未脱离皇权和神学的范畴,但由于知识大复兴的社会潮流,大学能够从教皇和君主手中获得特许状,并拥有一部分“学校自治、学术自由”的权利。此时的大学被定义为“教导的地方,自由教育的栖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知识能够成为其自身的终点。这缘于人们思维的构造,即无论何种知识,如果真切地成为知识,都可以是其自身

的犒赏……(学生)即使无法完全理解知识,也能感悟到知识的伟大轮廓,领会其存在法则,其各部分的比例,感受它的光芒和荫蔽,以及它的伟大和渺小”^{[5]78}。总之,大学为知识而生,教授们以广博的知识而闻名,大学除感受知识的光耀之外别无他物。这一时期的大学以古希腊的自由七艺为基本授课内容,开设文、法、神、医等人文学科专业,以修习高深思想和知识为主,远离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因此,此时的大学又被形象地称为“象牙塔”(ivory tower)。

从产生的背景和过程来看,早期大学与社会发展之间隐含着深刻的契约精神。12世纪之后,随着欧洲智识的复兴与文化权力的彰显,修会学校提供的浅陋知识已经无法满足渴望新知的启蒙人群,基督神学教义的混乱与晦涩也不利于传道和解惑,亟需更完善、更高明的理论来进行自我辩护;与此同时,伴随着市民社会逐渐成型和商业往来日趋频繁,国王也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由于教会神学和世俗统治的双重需求,教皇和君主不得不借助教师行会的力量,给予大学自治的权利。应社会和政治之需,大学须致力于知识的保存和传授,并培养具有虔敬思想和专业知识的精英阶层,从而为教会系统和世俗统治提供人才。由于中世纪宗教信仰的普世性,大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远离世俗。一方面,这是由于教会与君主力量的强大使得科学知识尚无法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亦是因为大学获得机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同时,必须付出远离世俗的代价。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的使命是通过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按照“上帝的意志”建构教会的世界秩序。

(二)“社会契约”的初次调整与近代大学的“研究”使命

大学与社会契约关系的初次调整发生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此时期是欧洲社会秩序产生重大改变的关键时期。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会打上中世纪的烙印,神学的桎梏以及陈旧的理论一直制约着早期大学的发展。16世纪之后,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导致中世纪大学赖以存身的陈旧社会秩序最终崩溃,宗教改革与皇权的衰落又不可避免地使大学褪去了昔日的光环。宗教改革的兴起颠覆了教会统治,资产阶级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由单一民族或数个民族联合构成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宰世界格局的政治实体,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归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大学也不例外。17、18世纪,产业革命的勃兴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了教育机会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渴望,然而传统的大学还沉浸于中世纪陈旧的知识 and 教条之中,因此必然会经历衰落的过程。大学的衰落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并行,这就导致了新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为大学“社会契约”的重新商定创造了条件。19世纪中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大学使命完成了新的转变。

柏林大学成立于1809年,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从柏林诞生的新理念,是大学应为研究高深学问而生,教学和科研并重。19世纪的德国大学理念脱胎于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主张知识是科学探究的结果,大学则是知识探究的场所。按照柏林大学的理念,教授不需要是教导多样课程的通才,而是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由于在传统(已确立的知识)和理性探究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因此各学科都需要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对已确立的知识进行再验,并获得发展。按照以上表述,大学需要以专业训练的形式进行组织和管理,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的培养。19世纪末期,德国大学成为领先世界的科研中心,为诸多国家所钦慕和仿效。

德国大学模式的出现是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在当时,宗教革命和皇权的衰落打破了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工业革命的勃兴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由此,知识,更为确切地说是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传统的小作坊、学徒制的技术传授在数量上和水平上都无法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因此,作为知识中心的大学必须直接面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从此,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性经验开始进入大学课程,招生规模和渠道也有所拓宽,大学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的科研中心,担负起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人员的使命,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锻造事业。

(三)“社会契约”的再次调整与现代大学的“服务”使命

大学“社会契约”的再次调整酝酿于 19 世纪末期,完成于 20 世纪中期,这段历史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在此期间,大工业时代的出现以及民主社会的发展,连同两次给人类带来无尽痛苦的世界大战,共同催生了一个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人类社会。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不仅要面向国家的利益诉求,同时还要体现社会的公共价值。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种更广阔的集中阶段,之前由于自然因素而产生的社会隔离,统统在新技术的发展之下被一一打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所有的组织机构都需要以更主动的姿态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每一个阶层甚至每一个公民的发展提供帮助。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大学由于本国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实用主义思想的兴起,率先完成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再次调适。通过康奈尔计划和威斯康星思想的确立,美国政府在不断学习德国大学模式,并继续保持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英国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在新的社会发展规划下,用一种新的办学理念来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新的规划体现于对美国西部地区的开拓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发展。根据社会新需要整合出来的新的大学使命,就是强调与社会进行频繁而直接的互动,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大学为社会服务是美国大学的典型特色,其开创性地打破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确认大学不仅要体现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还要实实在在地从事社会服务,为每一个公民——无论民族和文化——提供帮助,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现代组织的责任。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大学实力的增长,美国大学理念被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国,并逐渐成为近现代大学的一种主导模式,服务社会也成为现代大学的使命。

三、当今社会的发展向度与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

无论大学有多么辉煌的过去,我们都必须正视一个事实:社会一直都在变革,一成不变的大学不可能满足所有时代的需要。正如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所表明的那样:“现代大学是过去社会对于传统大学不满的产物。”^[6]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将会继续调整,现代大学的使命也必然出现新的转变。

(一)当今社会的发展向度

在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的、有着明显影响的社会运动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政治权力构成层面上,不断追求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情感心理的局部社会最高权力形式;其次,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在承认私有财产制度的合法性,以及承认人都是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理性人”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制度获得广泛认可^[7];第三,文化观念层面上,在“经济人”文化和“市场规训”的作用下,个人精神文化生活对物质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社会行为调节的基础取向主要依靠法律、制度等“他律主义”的外部治理手段,而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和宏大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个人道德自觉^[8];第四,知识进步方面,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刺激下、文化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应用性科学知识、实用知识受到推崇^[9]。由以上运动引导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形态,使其除却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三大显性使命之外,还在政治、文化和市场等方面隐含多重使命。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考虑当今社会的发展向度,可以发现有两个明显的趋势,即知识社会的成型和福利型社会的到来。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商业评论家迫不及待地宣称一个新的时代——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早在 1963 年,克拉克·克尔就开始对知识经济的特征进行论述。1973 年,丹尼尔·贝尔对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国会亦步亦趋地渐次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出现源于经济、技术与职业系统的转型。贝尔定义了此种转型的几个维度:从商业产品主导的经济模式向劳务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型、专业人员和等级素质的提升、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改革和政策制定的核心等。后工业时代发展所涉及的领域

不但包括我们熟悉的诸如零售、交通以及娱乐业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商业服务、通信、股票、政府、健康、教育和研究。当转型完成之后,劳务行业的工作者操纵的是符号和观念,而非物质产品。换句话说,主导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已经变成知识工作者。贝尔指出:“知识在任何社会的运作中都理所当然地不可或缺,后工业时代的独特性在于知识自身性格的转变,在组织决议和发展方向的转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论知识的向心性。”^[10]在知识社会中,所有的生产者都必须自觉地从事研究工作,从而推进理论知识的发展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当今社会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福利型社会的出现。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各国政府的角色纷纷扩展,公民与政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契约关系。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民主国家负有为公民谋取福利的责任,而不是完全依靠自由市场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福利政府”这一概念便由此而来。“福利政府”最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对于纳粹的“强权政府”而提出的。通过福利政府理念的提出,人们深刻意识到战争的危害,尤其认识到平民和战士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并最终达成了构建“福利型社会”的共识。根据西方学者的论述,福利型社会建立在政府对公民的一系列承诺基础之上,其首要的承诺是充分就业。政府不会再听任自由市场独立运行,而是对其进行干涉,使其进行稳定的上下波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充分的就业。福利政府的第二个承诺是为公民应对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提供公共保险,使其不会再因为失业、年老或疾病而失去生存的最后保障。福利社会的终极承诺是确认公民身份,这意味着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H·马绍尔(Thomas H Marshall)认为公民身份具有三层基础:民事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公民身份的要素由各种必要的公民权利组成,如个人的解放,言论、思想以及信仰的自由,拥有私人财产以及协定有效合同。与民事公民身份联系最密切的机构是法院。政治公民身份意味着“作为政治权力当局授权机构的一员,或是该机构成员的选举者参与政治权力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公民身份涉及“从对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到全部社会遗产,再到符合社会当下普遍标准的、有教养的生活等全部领域的权利享有”^[11],与之密切相关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部门。民事公民身份由于18世纪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有所扩展,政治公民身份的扩展则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首先接纳了工人阶级,随后又将公民选举权延伸到所有的男性,最后全体女性也拥有了完全的政治公民身份。社会公民身份是20世纪福利政府的产物,此种身份承认公民从福利政府中获得的利益是应得的,而不是被施舍的。除此之外,社会公民身份还是兼容并包的,它给予一切人成员资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福利型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议题。

(二)现代大学历史使命的发展趋向

早在1967年,丹尼尔·贝尔就预言:“如果在过去的—个世纪中企业是社会的核心机构,因为其为实现产品的大规模创造而组织生产,那么在下个世纪,大学将成为社会的核心机构,因为其所扮演的社会改革和知识创新之源的角色。”^[12]20世纪90年代以降,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逐渐成型,福利型社会广受推崇,大学的历史使命也必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除传统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外,大学还将担负起充当公共空间与交往中心、构建民主政治核心平台、调和市场与政府利益诉求等新的使命。

首先,知识社会的到来赋予了大学一个新的使命——充当公共空间与交往中心。在后工业时代,知识成为最核心的力量,作为知识策源地的大学被推向了舞台的中央。随着高等教育日益地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社会对大学寄予更多期望,也给予大学更多支持,而大学也越来越地和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其影响已经超越了知识的范畴以及经济领域,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日益成为公民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大学可以称为现代知识社会中互相交流的最重要场所。“大学必须成为这样的—个场所,与其他场所相比,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对社会关系进行思考而不依靠统一的理念,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国家的理念

……使多元认识的存在制度化,并使大学成为一个公开辩论的场所。”^[13]¹⁴⁹一方面,大学学术的理性思维和创新精神能够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一种兼容并包、温和中立的平台,引导人们形成有利于民主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大学学术扮演了社会心理的理智过滤器角色,引导公共理性的生长和成熟;另一方面,大学集中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是科学知识与文化知识的生产者与改革者,基于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理性精神,大学在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依靠人性矫正和理性坚守,通过文化自主、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大学能够对公共空间中的事件和价值进行澄清,对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进行解读和弘扬,对有碍长远利益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引导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明确并实现公共利益。

其次,在福利型社会中,人们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参与社会的成员资格,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也要求人们拥有理性和才智,因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个核心的公共承诺,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平台。易于接近的大学教育是社会公民权的必要构成,大学教育的主体——本科教育、职业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科学研究等,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民主角色。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是人们获得政治公民身份的核心承诺;职业教育能够保证人们拥有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培养从业者的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感;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则是深化社会改革、实现公共利益的智力平台。不仅如此,大学作为一种研究机构,对于社会理念的革新也能够起到无可比拟的促进作用。在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国家建设的重要抉择时常需要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审议,而唯独大学学术有能力在综合考虑自然、社会和人文等众多因素的基础上,对之提供最为全面的咨询和指导。

最后,现代大学还具有联结政府和市场的纽带功能,需要担负起调和国家利益和市场诉求的使命。英国学者德兰迪认为,在当前社会中,大学、政府和工业构成了一种“三重螺旋结构”:政府关注大学的重点之一,是使大学为技术文明服务;全球化将大学推向市场,但市场又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学越来越多地从社会获得资助并与工业联合,但仍然需要对政府的压力做出反应^[13]⁹。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大学的专业设置和科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影响;反过来,大学的研究成果也直接影响市场的生产方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通过科学分析、理性思考,进行社会问题的解释、发现和反思,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为市场提供技术和指导,是大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做出的回应。当然,学术研究必须遵循自己的范式,因此大学不是通过直接服从命令来做出回应,而是通过自由、独立的科学探索来满足国家的利益和市场的诉求。

参考文献:

- [1]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15.
- [2] Bok D.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 [3] 托尼·比彻,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 唐跃勤,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 [4]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大学的兴起[M]. 王建妮,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 [5] Newman J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M]. 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49.
- [7] 李鸿昌,朱新涛. 从“市场规训”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J]. 中州学刊,2006(6):14-17.
- [8]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8-33.
- [9] 朱新涛. 现代大学对中世纪大学的继承与反叛[J]. 高等教育研究,2007(4):11-15.
- [10]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M]. 3r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20.
- [11] Marshall.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M]. London: Heinemann, 1963:74.
- [12] Bell D. Notes o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J]. The Public Interest, 1967(6):24-35.
- [13] 德兰迪. 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Historic Evolution and Future Ten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CUI Yan-qiang¹, DENG Lei²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s a long standing and well establishe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also a core value of civic society, which could provide theoretic guidance and value judg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c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theory,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embodied in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After the Middle Ages,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had experienced several great adjustment. Therefor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had also changed several times. At present times, the society has started to enter the era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e to that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contract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has a fresh expression, so there must be som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contract theory; the university mission; knowledge society; welfare society; modern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邓香蓉

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

教师教育质量与学习：实践、政策与创新

会议主题:教师教育质量与学习

分主题:教师教育体系与质量;教师和教师教育的质量属性;教师教育与教师学习;教师教育与学生学习;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创新理念与实践

会议时间:2014年10月17日—20日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语言:中文、英文

会议资助:本届峰会承蒙田家炳基金会支持,特设立“田家炳-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青年学者专项奖金”,为参与峰会的青年学者提供资助,并颁发获奖证书。欲了解详情和报名事宜,请登录峰会网站查询。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支持单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100875

联系人:宋萑、袁丽、李盛男

联系电话:86-10-58804316-602;86-10-58804316-601;86-10-58804318

传真:86-10-58804318

电子邮箱:gtes2014bnu@gmail.com

会议网址:<http://www.cter.org.cn/>